

研究論文

# 內外之間的關聯政治：中國電視國際新聞研究<sup>1</sup>——以CCTV《新聞聯播》為例

周葆華

## 摘要

學者常將國內新聞與國際新聞分開研究，而較少關注兩者之間的關聯。本文引用國際政治學中的「關聯政治」(linkage politics)概念，通過對CCTV《新聞聯播》節目的內容分析，論述了中國電視國際新聞報導中存在的「關聯政治」機制——即通過自我優先、內外對比、敏感新聞最小化等操作策略，使國際新聞與國內新聞相互映襯，達到維護國家整合與認同、鞏固政權合法性的目的。關聯政治的運作機制主要受到黨—國新聞體制和傳媒市場化過程中將民族主義作為商業策略等因素的影響，但在傳媒改革進程中亦有局部的差異化呈現。

關鍵詞：關聯政治、國際新聞、中國電視、CCTV、《新聞聯播》

---

周葆華，傳播學博士，現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復旦大學傳媒與輿情調查中心主任助理，復旦大學資訊與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研究興趣包括受眾與效果、新媒體與民意研究。電郵：zhoubaohua@yeah.net

## **Linkage politics in Chinese TV foreign news: A Study of *Xinwen Lianbo* of CCTV**

ZHOU Baohua

---

### **Abstract**

News is classified as domestic or foreign by whether news events occur inside or beyond national boundaries. The two types of news are often studied separately, and researchers seldom explore how domestic and foreign news a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This paper applies the concept of “linkage politics” to explore the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the inside and the outside within the context of foreign news production in post-reform China. Based on a content analysis of CCTV newscast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party-state power harnesses foreign news for domestic purposes by a number of operational strategies, such as self-prioritization, setting foreign news as comparison, and minimization of “sensitive” news. These strategies are aimed at legitimizing the existing political institution and facilitating internal cohesion. The findings will be discussed in relation to the context of China’s social as well as media reform,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a form of marketized authoritarianism.

**Keywords:** linkage politics, foreign news, Chinese television, CCTV, *Xinwen Lianbo*

九八九八不得了，糧食大豐收，洪水被趕跑。尤其人民軍隊更是天下難找，百姓安居樂業，齊誇黨的領導。國外比較亂套，成天勾心鬥角，今兒個內閣下臺，明兒個首相被炒，鬧完金融危機，又要彈劾領導，縱觀世界風雲，風景這邊獨好。

——趙本山，1999

「縱觀世界風雲，風景這邊獨好」，這是中國大陸最紅的喜劇明星趙本山在1999年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上的一句經典臺詞。臺詞一出，滿堂歡笑，笑聲的背後卻生動浮現出內外之間的複雜關聯。趙飾演的東北老農，將「成天勾心鬥角」的國外「亂套」與「糧食大豐收，洪水被趕跑」的國內成就相映照，讀出了「風景這邊獨好」的意蘊。國際是嘲諷的對象，國內是歌頌的主體。

是甚麼在塑造着這些內外不同的意象？「趙式老農」從何處感知外部世界？恰如李普曼在經典的《民意》一書中所指出的，新聞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Lippmann, 1922)。新聞因其報導物件所處空間不同而分為國內新聞與國際新聞，前者發生在本國之內，主要建構國內形象，後者發生於本國之外，主要建構外國形象，兩者似乎涇渭分明，故常常區分開來分別研究。然而，趙氏小品卻反映出一個事實：內外新聞並非獨立的存在，相反卻相互映襯產生「化學反應」，建構出一個「亂雲飛渡仍從容」的中國形象。由此引發出國際新聞研究中一個頗值探討但又常被忽視的議題：國際新聞與國內新聞之間如何關聯？作為共享特定主流意識型態和文化價值觀念的媒介產品，它們在多大程度上相似、又在多大程度上差異？國際新聞的生產會否考慮其國內影響並在此基礎上形成與國內新聞的互動關聯？這些關聯在特定政治結構與媒體制度下如何可能？又如何呈現？概言之，本研究希望打破內外新聞分別研究的單一思路，考察內外之間的互動。

探討這一議題在中國改革開放與社會轉型的歷史場景下別具意義。國際新聞與國內新聞、國際環境與國內氣候之間的關係是中國改革開放歷史進程中蘊含的核心張力之一。一方面，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打開了中國全面融入世界的大門，內外交流日益增多，特別是隨着2001年加入WTO，中國進一步匯入全球化浪潮，成為世界體系的一

部分，世界政治、經濟、文化都在衝擊着傳統封閉的政經體系和普通民眾的價值觀念；另一方面，黨一國主導的政治體制和媒體制度又極力強調維護中國民族國家的核心利益、保持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發揚中國社會的傳統文化。國際新聞就報導內容與題材而言無疑位於擁抱世界的前沿，但生產與傳播又處於內部體制的核心，因此在它身上典型地反映着內外之間的矛盾與張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呈現並揭示這種張力，也構成對中國媒體改革和社會轉型一個獨特向度的剖析。

具體地，本研究將基於「關聯政治」(linkage politics)的理論視角，通過系統的內容分析探討中國電視國際新聞中所展現的內外關聯及其操作策略。論文將從有關國際新聞全球化與本土中心化的討論出發，引出「關聯政治」概念，繼而結合中國改革開放和電視體制的情境提出具體的研究假設或問題，然後通過對中央電視臺(CCTV)《新聞聯播》節目的內容分析加以檢驗和回答，最後對中國國際新聞中的「關聯政治」機制進行總結，並探討其在社會轉型和媒體改革背景下差異化的呈現方式及其影響。

## 國際新聞的本土中心化與關聯政治

### 國際新聞的全球化與本土中心化

國際新聞就其題材而言具有天然的全球性，特別是對電視新聞而言，要躋身短短十數分鐘的有限空間，新聞事件必須具備國際性影響，具有成為各國共同議題的潛力。像是911事件與伊拉克戰爭、奧運會與世界盃等，往往經由衛星電視的全球直播成為「媒體事件」(Dayan & Katz, 1992)，參與建構「同一個世界」(one world)的集體想像。全球化的理論家們傾向於相信，隨着全球化浪潮的深入，特別是新媒介技術(如衛星電視和互聯網)的發展，國際新聞的同質性與一體化特徵將日益明顯(Giddens, 1990; Lash & Urry, 1994)。當然，在界定國際新聞的全球價值上，所有的國家並非平等存在(Chang, 1998)。國際新聞的全球流動受到國際政經秩序與權力關係的影響，形成發達國家居於中心、發展中國家處於邊緣的「中心—邊緣結構」(Center-Periphery

Structure)，並由此引發了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世界資訊與傳播新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NWICO]) 的長久呼籲與抗爭 (Galtung, 1971)。全球化時代，國際新聞的日趨同質化並未抹平全球新聞流動的不平等，相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設置全球議程上擁有更多權力 (Boyd-Barrent & Rantanen, 1998)，而國家特質 (national traits)、特別是政經實力，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着其被國際新聞報導的機率 (Kariel & Rosenvall, 1984; Ishii, 1996)。

國際新聞的全球化敘事只是硬幣的一面，另一面則是對於國際新聞本土中心化 (ethnocentrification)<sup>2</sup> 的論述。這套論述建諸兩個基本事實：第一、全球化不應看作「一個完全顛覆民族國家的過程」，而民族國家仍然是「建構全球化過程中強有力的因素」(Sreberny-Mohammadi, Winseck, McKenna, & Boyd-Barrett, 1997: xi)。在國際話語領域，最重要的是與國內政治權威和利益關係密切的民族國家，其內部的差異則往往存而不論 (Sreberny-Mohammadi, 1991)。既如此，民族國家的利益、主流意識型態及價值觀必然是影響國際新聞生產的核心要素；第二、除了 CNN 或 BBC world 之類的跨境電視，絕大多數電視新聞節目的受眾仍是本國觀眾，因此電視新聞包括國際新聞在內必然主要服務於本土觀眾的意識型態、主流價值與欣賞口味。

梳理現有研究，對「本土中心化」的闡釋在三個層面上展開：

首先，在各國電視新聞中，與國內或本地新聞相比，國際新聞處於次要地位，報導數量和深度有限。美國的研究就發現，電視新聞主要關注國內，國際新聞只有當其達到「危機」程度時才可能進入報導視野 (Gonzenbach, Arant, & Stevenson, 1992)。張讚國等對中國電視國際新聞的過往研究也發現，無論就數量或長度而言，國內新聞的比重均大大超過國際新聞 (Chang, Wang, & Chen, 1998; Chang, Wang, & Chan, 2002)。而一旦發生經濟衰退、媒體要縮減開支，首當其衝也必然是國際新聞 (Utley, 1997)。概言之，國際新聞不是電視新聞的主角，只是聊備一格的點綴。

其次，在有限數量的國際新聞中，又以與本國利益相關更受重視。從新聞生產社會學的角度出發，判斷國際新聞價值 (newsworthy) 的因素，除了常規的顯著性、反常性、衝突性、趣味性等之外，那些

代表被報導國與所在國之間相關性(relevance)的變數在國際新聞生產中受到重視，特別是接近性(proximity)、關聯性(interaction)等。經驗研究表明，兩國之間經濟貿易量的大小、是否曾同屬殖民地、語言相近程度、外交聯絡程度，均與其被報導的數量成正相關關係(Johnson, 1997; Wu, 2000)。張讚國等的研究也揭示(Chang et al., 2002)，《新聞聯播》集中報導哪些外國受到本國利益和外交政策的影響。

第三，儘管在全球化時代可能存在共同的議題，但各國會依據本國國家利益和主流意識型態架構詮釋新聞(Entman, 1991; Kaid, Harville. Ballotti, & Wawrzyniak, 1993; Grundmann, Smith, & Wright, 2000; Lee, Chan, Pan, & So, 2000)。這方面的研究典型體現在「馴化」(domestication)分析上(Cohen, Levy, Roeh, & Gurevitch, 1996)。所謂「馴化」即指新聞從業者通過種種策略，強化外國事件與本國受眾的關聯性，並把它納入民族國家論述範疇的過程。陳韜文等(2002)以各國傳媒報導1997年「香港回歸」為例，指出常見的「馴化」策略包括：派遣本國民眾熟悉的名記者去採訪、把外國事件放入一個更大的，能為本國民眾理解的架構、與本國文化熟悉的案例比較、訪問本國高級官員、納入本國的政治解釋框架中等等。決定這一馴化過程的，主要是各國的「長久價值觀」(Gans, 1979)、國家利益與外交政策(Lee & Yang, 1995)，以及各國內部不同的媒體類型、市場定位、組織約束、記者認知等(陳韜文、李金銓、潘忠黨、蘇鑰機，2002)。經過「馴化」，傳媒得以拉近外國事件與本國受眾的關係，並使得本國主流意識型態和民族國家的身份認同得以「再生產」。

### 關聯政治(linkage politics)及其在國際新聞中的體現

上述「本土中心化」論述特別是「馴化」理論充分顯示了在全球化的語境中，國際新聞的生產實質上是本土化、國內化的，全球化並未帶來各國國際新聞的高度同質化(homogenization)，相反國際新聞的生產仍舊基於各自的利益和情境，在國際空間內產生話語爭鬥(Fenby, 1986; Lee et al., 2000)。本文認同這一基本判斷，但認為現有理論尚無法充分概括與回應國際新聞生產中的「本土中心化」機制與策略。其不足之處主要在於：首先，從分析視角來看，無論是新聞價值的「相關性」研

究，抑或「馴化」分析，本質上都是以國際新聞作為單一研究物件，而作為構成新聞節目的有機整體，國內新聞與國際新聞如何發生關聯，以及這種關聯如何影響着國際新聞的生產與呈現，在現有的理論框架下很少涉及；第二、就分析思路而言，無論是側重外國與本國的關係，還是強調本國意識型態與權力結構的影響，多少都隱含着單一線性思路——外國特質或本國脈絡影響國際新聞的生產，因此存在着將現實中內外之間的複雜關聯簡約化的風險；第三、現有「本土中心化」生產機制的分析多在西方國家被提出和發展，因此主要着眼點在於國際新聞通過這些生產邏輯，方便其本國受眾接受和理解，並進而主要換取的是經濟利益和市場回報，儘管其中不乏對於政治因素的考察，但很少充分展開。因此本文對中國大陸具體場景的分析，將有助於揭示政治控制和市場機制交互作用下國際新聞「本土中心化」的特殊運作形態，從而對「本土中心化」的相關研究形成豐富與補充。

基於上述考量，本研究引進國際政治學中的「關聯政治」(linkage politics) 概念來探討國際新聞生產中折射的內外關聯問題。「關聯政治」概念最早由政治學者羅西瑙(Rosenau, 1969)於1969年提出，他指出以往的國際政策研究僅僅立足於單一的國際體系結構分析範式——從國際間實力對比的角度探討國際政策的形成，然而國家對外行為的決策離不開國內因素的參與，即在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之間存在着複雜的關聯現象。國內政治可以影響國家的對外政策，而國際形勢同樣影響國家內政，外交是內政的延續，而內政也可被外交改變。在歷史經驗中，「關聯政治」的現象俯拾皆是而又形態各異。一方面，外交政策的失利會降低政府的權威，從而引發國內衝突。例如1919年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外交失敗，消息傳回國內，立即引發了青年學生反政府的「五四運動」，進而改變了中國近現代歷史的進程。另一方面，恰如研究社會衝突的學者所指出的(Coser, 1956)，與外部群體的衝突有助於加強群體內部成員的團結與凝聚，產生動員效果，甚至淡化國內存在的矛盾與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外部威脅也可能促成國內整合。一個常被提及的例證是：1930年代的日本侵華戰爭，被認為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國內政治格局，促成了國共兩黨的二度合作，並影響了日後兩黨的力量博弈(Liao, 1976)。在外部影響內部的同時，內也可能影響

外，例如內部的政治變局會帶來外交政策上的明顯改變——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被認為是導致其退出一戰的重要國內因素。因此，內與外雖因有形邊界而分開，卻無時無刻不在關聯之中。

「關聯政治」的思想影響了二戰後國際政治學的研究範式，產生了該學科中所謂「研究層次回落」的現象——即從傳統聚焦國際的單一體系層次向國際與國內兩個層次結合分析的方向轉移(李巍、王勇，2006)。在經驗研究層面上，普特南等學者提出「雙層博弈」(two-level games)模型，來分析外交決策中國內因素與國際因素的交叉互動，指出外交博弈不僅在國際談判桌前展開(與其他國家進行利益博弈)，而且需要得到國內「談判桌」的批准(表現在議會、黨派、利益團體、公眾等之間展開博弈)，因此從一開始就處於「雙層博弈」之中(Putnam, 1993; Milner, 1997)。遵循「關聯政治」的思想，廖光生(Liao, 1976; 1980)曾運用經驗材料分析了中國「文革」期間如何將國內動員與對國外敵意相勾連，指出官方在大眾媒體上批判外國很大程度上出自服務於國內政治運動的需要。雖然並未使用「關聯政治」的概念，薩伊德(Said, 1981, 1993)指出，西方媒體和學界通過建構一個「東方主義的他者」為本國的對外擴張和政治利益提供依據，而其後開拓的後殖民主義研究擴大了他的概念，認為發展中國家或伊斯蘭國家同時也在建構一個「西方主義的他者」來強化本國的政治宗教統治。隨着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轉型的進程，學者們指出中國的對外政策正從「單層博弈」走向「雙層博弈」，例如中國在對外談判「入世」的過程中同時受到國內利益相關方的影響(鐘龍彪、王俊，2007)。

由於「關聯政治」關注內外之間關聯的思想，它對探討國際新聞的生產和呈現具有相當的啟發意義。首先，恰如內政與外交可以相互影響，國內新聞與國際新聞、以及國際新聞與國內格局之間也可以相互影響，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內外之間政治的關聯恰恰經由媒體仲介而實現——1919年「巴黎和會」與「五四運動」之間的關聯無法離開前者資訊的傳播，而日本入侵與國共團結的關聯亦無法脫離媒體對當時內外格局的建構；其次，與外交決策面臨「雙層博弈」相似的是，國際新聞的生產亦呈現「一體兩面」——一方面要及時報導世界發生的重大新聞，匯入全球新聞洪流，特別是對於任何一個已經融入世界體系的「正常國



家」而言；另一方面，這些新聞又必須適合國內政策、制度與情境，必須考慮其可能造成的國內影響。恰如外交博弈需要同時面臨兩個「談判桌」，國際新聞實際上也處於兩個隱形的「談判桌」之間。因此，國內新聞與國際新聞需要整合地加以考察，而闡釋國際新聞生產的「本土中心化」機制時，亦不能離開內外之間「關聯政治」的視角去抽象地分析國際新聞的決定因素。

由此可見，「關聯政治」視角並非現有的理論範式所能涵蓋。例如「馴化」分析主要探討媒體如何基於主流意識型態將外部的國際事件內在化，即如何「化外為內」，利於接收；而「關聯政治」的涵義則側重在，第一、內外新聞之間如何關聯，如何共同建構一個整合的外部世界形象，以適合主導意識型態或權力中心的需要（即「以外利內」，而非「化外為內」）；第二、國際新聞的生產如何在既要融入世界、又要契合國內的格局下平衡博弈，在特定的政經體制和媒體制度下又有何表現。本文以下的部分，即主要以「關聯政治」的視角具體剖析中國國際新聞的生產策略與內容呈現。

## 中國大陸：國際新聞關聯政治操作的現實情境

### 改革開放中的關聯政治需求

一方面，對外開放作為基本國策推動中國融入世界體系，成為多極世界的重要力量。國家和領導人強調「中國發展離不開世界」（胡錦濤，2007），鼓勵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積極地融入國際社會，與美國等西方大國在經濟、金融、反恐、環保等全球議題上合作，所有這些都要求保持國際新聞的比重，帶給國人充分的國際訊息，特別是不要遺漏重大的全球性事件。在這個層面上，中國的國際新聞無法置身於世界格局之外。

但另一方面，從黨一國到媒體都試圖極力保持「中國特色」，民族主義和防止「和平演變」成為擁抱全球化的協奏曲。首先，官方非常警惕國外資訊傳播對國內政治穩定造成的可能影響，因此在媒體改革中，一直對外資、特別是西方資本、包括新聞與文化產品的輸入持非

常警惕的態度(Chan, 2000)。從限制海外衛星電視落地、到禁止外資進入新聞生產的核心領域、再到傾力打造互聯網「國家防火牆」，固然有經濟保護的考慮，更有意識型態的衡量。在黨—國體制的這一主導思想下，國際新聞雖然並非純粹的「另類媒介」(alternative media)，但因從報導物件、題材到初始生產過程<sup>3</sup>都打上了西方國家和媒體的烙印，也就可能成為潛在的另類內容，由此產生了關聯政治的操作需求——國際新聞必須服務於內政、服務於國家穩定，而決不允許成為國內政治體制的破壞者、挑戰者或潛在威脅者。

如果說防止「和平演變」主要出於官方意志，民族主義的崛起則包含了黨—國體制與民間的互動。研究者發現(黃煜、李金銓, 2004)，1980年代由於中共黨內開明派和知識份子結盟推動學習西方，故民族主義的色彩尚不明顯；但自1989年之後，官方在主流意識型態領域將民眾與黨和政府之間的衝突轉化為中國和西方資本主義霸權之間的鬥爭，民族主義由此上升為一股主流思潮，也成為階層分化時代國家整合的重要力量。官方宣導的愛國主義與民間的民族主義匯流，在一系列危機外交事件中表露無遺——從1990年代中後期開始的以反對美國為主的抗議，到新時期借助互聯網等新媒介為平臺表達對日本、法國、韓國等國的不滿。在這種思潮影響下，中國公眾關心國家利益——作為「中國人」或「中華民族」這一「想像共同體」的集體利益，形成「我們」(中國/中國人)與「他們」(外國/外國人、特別是西方/西方人)的二元區分，呼喚「大國崛起」，樂於見到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榮光。民族主義思潮因此同樣為國際新聞生產中的關聯政治操作奠定了現實的土壤——強調中國的國家利益，塑造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強國形象，激發民眾的自信心與自豪感。相比於防止「和平演變」的官方話語，民族主義更安全、更柔軟，它既可成為黨—國體制用以佐證政權合法性的有效證據，又可成為媒體迎合受眾情緒換取商業利益的上佳素材。

因此，國際新聞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場景中從來就不是超然的存在，而是與內部政治權力結構和民間情緒緊密結合的話語。官方立足於防止國際新聞對內部的負面影響，民眾則願意從新聞中感受大國榮光，這就使得國際新聞與國內新聞一道，成為促進國家認同、整合動員民眾的重要手段。在談到國內、國際新聞報導的指導思想時，中

宣部部長劉雲山(2006)明確提出：「要把國內因素與國際因素聯繫起來，報導國內新聞要用國際視野考量，報導國際新聞要以國家利益為根本準則」。這話典型地體現了「關聯政治」的現實需求。何謂國家利益？當然首先包括對既有體制的維護和政權合法性的鞏固。「關聯政治」在中國國際新聞中的操作，主體清晰、需求明確。

### 關聯政治的操作保障：中國電視媒體制度

黨一國力量基於核心政治利益、並依託民族主義土壤所產生的關聯政治需求要轉化為媒體的新聞實踐，依賴中國媒體制度的運作。由於電視依然是中國大陸最為普及、接受度最廣的媒介，也是受眾獲取國際新聞的最主要途徑，<sup>4</sup>因此本文對中國國際新聞關聯政治的分析主要集中於電視。中國電視起步於1958年北京電視臺(現中央電視臺前身)的開播，到2008年中國共有277座電視臺，開辦電視節目1356套(王蘭柱，2009)。其中國家級電視臺有中央電視臺和中國教育電視臺，每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以及每個地級以上城市基本都擁有一座電視臺。

與中國媒體改革的主旋律一致，電視媒體從1978年至今經歷了被學者概括為「產業化」的體制變遷過程(黃升民等，2009)。其特徵是：承認並引進市場力量，推動電視從依賴國家撥款到主要依賴廣告獲取經濟利益，並按照受眾和市場需求改革新聞實踐和其他類型節目的生產。1979年1月上海電視臺率先播出「文革」後第一條電視廣告，到1990年代廣告全面取代國家財政撥款，成為電視自負盈虧的主要經濟來源，2009年中國電視的廣告總額已達654.03億元(朱虹，2010)。在加入WTO面臨國際傳媒巨頭競爭壓力的背景下，中國電視媒體在政府主導之下開啟集團化歷程——1999年第一家廣電集團(無錫廣電集團)誕生，2001年國家級的中國廣播影視集團、以及北京、上海、江蘇等主要省市的廣電集團陸續組建，成為資源整合和市場運作的主體。在市場刺激之下，電視內容逐漸走出全能國家的僵化話語場域，改革了新聞「語態」和娛樂節目樣式，在新聞深度報導(如《東方時空》)、民生新聞(如《南京零距離》)、綜藝娛樂節目(如《超級女聲》)、電視劇(如

《士兵突擊》)等領域贏得了市場成功。

然而，正如潘忠黨(1997)所指出的：中國媒體「有限創新」的制度變遷過程，並不以挑戰黨的新聞體制為前提，相反是在維護這一基本體制的基礎上，強化並運用市場力量，重構新聞體制的內部空間。因此，中國電視媒體「事業性質」和「宣傳喉舌」的功能定位並未改變。電視在資產上屬於國有，定位上屬於喉舌，人事安排和編輯方針上受到各級宣傳部門和廣電局的嚴格管控。電視新聞必須首先完成黨的宣傳任務，受到以宣傳通知等為手段的直接政治控制；外資和民營資本迄今不允許進入電視播出領域，在節目製作領域亦被排除在新聞之外；雖然組建廣電集團，但長期堅持單一的「事業集團」屬性，限制跨地區經營、投融資改革等真正的企業行為；雖然2009年上海率先進行了新一輪「制播分離」改革，但也僅僅是剝離出製作環節組建節目製作公司以利於擴大經營和上市融資，而播出平臺和職能部門仍保持事業編制，以確保對輿論導向的嚴格把關。因此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電視擁有了高度、甚至過度的商業經營，卻不存在純粹的商業電視臺，當然也沒有不依賴廣告的公共電視臺。中國電視的性質屬於黨—國嚴格的人事和內容管控之下，在經營上自負盈虧的事業單位，或何舟(He, 2000)所稱的「黨營輿論公司」(Party Publicity Inc.)。在這樣的電視制度安排下，黨—國「關聯政治」的需求得以順利地轉化為媒體的新聞實踐。

需要指出的是，包括電視在內的中國媒體制度的變革呈現出「邊緣突破」的特點(潘忠黨，1997)，即改革的行動往往首先在距離「黨的新聞事業」原則核心較遠、意識型態色彩相對較淡的地帶展開。從這個角度來看，電視相對於報紙、雜誌處於核心，而國際新聞表面看來因報導外部事務，似乎偏離國內政治的核心地帶，因此局部區域——特別是非政治性國際報導有條件成為「邊緣突破」的入口；但另一方面由於「關聯政治」的影響——其與國家利益、外交政策密切相關，且中國歷來奉行「外交無小事」的指導思想，所以電視國際新聞、尤其是硬新聞又屬高度管制的領域。2009年上海曾發生過因播放自行採制的紀錄片《直擊朝鮮》而導致朝鮮抗議的外交事件，相關編導受到嚴厲懲罰。<sup>5</sup>紀錄片尚且如此，新聞管制之嚴格更可想像。

所以，中國目前的電視體制為黨—國力量的關聯政治操作提供了

便捷的路徑保障。但須強調的是，恰如中國新聞體制改革是「上下合謀」的結果，黨一國力量的關聯政治操作也離不開媒體組織在政治控制和市場誘惑下的自覺實踐，尤其是民族主義的素材是媒體難以抗拒的「美味點心」。另一方面，在新聞從業者層面，西方研究發現，記者在報導國際新聞時相比國內新聞更多面臨新聞專業主義與愛國主義之間的張力，更有可能產生「國內偏見」(domestic bias) (Nossek, 2004)，並願意為國家利益讓度職業理念 (Herman & Chomsky, 2002)，有學者因此指出美國媒體在報導國際新聞議題時「團結在星條旗周圍」(Broday, 1991; Cook, 1998; 轉引自 Lee et al., 2000)，監督政府的傳統消失在國家利益對抗的邊界上 (何英, 2004)。在專業主義僅有局部與碎片式呈現的中國大陸 (陸曄、潘忠黨, 2002)，新聞從業者在國際新聞的實踐中更少對來自黨一國體制的關聯政治操作產生抵抗。掌握國際話語權，不能跟着西方媒體走，「新聞記者是有祖國的」，成為從官方到媒體從業者的共用話語 (丁剛, 2005; 張森, 2006; 袁雷, 2009)。

### 關聯政治的分析樣本：《新聞聯播》

在中國電視體制中，中央電視臺 (CCTV) 居於核心地位。黨一國體制一方面為確保對輿論的掌控權，另一方面也基於央視獲取的巨額利潤，<sup>6</sup>故給予央視在市場競爭中獨特的壟斷待遇。即便目前中國各省 (市、自治區) 已至少各有一個電視頻道上星，但政策和資金的優勢使得中央電視臺的主要頻道均位於全國電視覆蓋率的前列，其主頻道綜合頻道 (CCTV1) 2008 年的覆蓋率達到 97.1%，而省級衛視中覆蓋率最高的山東衛視覆蓋率也僅為 78.5%。(王蘭柱, 2009)

《新聞聯播》是央視最主要的新聞節目，每晚 7 點在 CCTV 綜合頻道和新聞頻道播出，除極個別情況外 (如鄧小平逝世或黨代會)，時長 30 分鐘。它於 1978 年創辦於央視，是黨的新聞體制金字塔的最頂端，受到黨一國體制的全力保護。1981 年 4 月舉行的全國電視新聞工作座談會規定各省 (市、區) 電視臺必須轉播《新聞聯播》節目，1993 年中宣部和廣電部下發通知，要求各級地方台 (站) 必須以專用頻道完整轉播中央電視臺的第一套節目，且在轉播時不得插播自辦節目和廣告 (陳力

丹、焦中棟，2008)。這使得該節目在晚間黃金時段缺乏競爭者，獲得了在全國範圍內壟斷性的收視保障，成為收視率最高的新聞節目。據CSM測量儀統計，2008年CCTV1《新聞聯播》在全國的平均收視率為8.7%，平均佔有率為24.1%；如果加上各省的分別轉播，其每晚的觀眾規模至少達2億左右(王蘭柱，2009)。正因如此，《新聞聯播》後的第一廣告位成為「黃金中的黃金時段」，每年進行公開招標，拍得的贏家稱為「標王」，2009年短短5秒鐘廣告位「標王」價格高達4,720萬元人民幣(CCTV.com，2009)。

《新聞聯播》作為黨一國體制的核心喉舌，承載着宣傳國家主導意識型態、整合國家與動員民眾的任務，並由此形成了從報導內容到播報方式都極端政治化的「聯播體」封閉結構，其數十年不變的新聞語態廣受詬病(艾紅紅，2008)。不過，在媒體市場化改革浪潮中，這個原本最難「邊緣突破」的節目亦面臨變革的壓力與動力。從國家領導人到基層觀眾對節目僵化保守形象的不滿、地方電視臺民生新聞節目的崛起、互聯網等新媒介的衝擊，都促成了《新聞聯播》自身的「邊緣突破」。近年來，《新聞聯播》的改革主要集中於「軟化」，包括啟用年輕主持人、增強軟性新聞等。耐人尋味的是，《新聞聯播》「邊緣突破」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國際新聞，尤其是2009年央視提出了新聞改革的「三強化」——「強化國際報導，強化對國際熱點的關注，強化經濟報導貼近性」(劉鵬雲，2009)，前兩條均與國際新聞有關。這說明，《新聞聯播》在國內新聞難以改變的情況下，試圖以報導外部事務為主的國際新聞來增強其可看性與接受度，這一現象部分證實了國際新聞的「邊緣」地位假說，也為我們觀察《新聞聯播》國際新聞的關聯政治提供了新的情境。

之所以選擇《新聞聯播》作為分析樣本，除了其全國最高的收視率外，還在於它框限了地方電視臺國際新聞報導的基本內容與模式。與國內新聞或本地新聞不同，在國際新聞領域，地方電視臺沒有獨立採訪權，因此均必須依賴中央電視臺的報導。2006年針對「一些國外通訊社和媒體通過多種管道向國內地方電視臺推銷國際新聞素材，帶有明顯政治意圖」的背景，廣電總局專門發出《關於重申電視國際新聞管理規定的通知》，明確規定「各級電視臺播出的國際新聞必須統一使用由中央電視臺、中國國際廣播電臺提供的電視國際新聞」，不允許自行使

用從境外衛星電視收錄或從其他管道獲得的國際新聞素材、或者將境外衛星電視圖像配以新華社文字稿進行播出。因此《新聞聯播》對中國電視國際新聞具有充分的代表性。

國際新聞的生產與流通具有明顯的不平衡性，全世界每天的國際新聞大約80%由三大通訊社（路透、美聯、法新）提供（福特納，2000），囿於實力所限，《新聞聯播》國際新聞的來源亦處於「外購為主、自采為輔」的階段。除了少量來自中央電視臺（駐外）記者採制的新聞外，國際新聞的主要來源是路透社和美聯社，中央電視臺每年都購買它們的新聞稿件、錄影素材和直播信號，同時還與美國有線新聞網（CNN）簽訂了電視新聞交換協定（張森，2006）。在新聞來源受制於西方媒體的前提下，《新聞聯播》格外強調通過選材、編輯、組合、及利用新華社文字稿等手段對國際新聞進行把關。負責國際新聞的主編張森（2006）在其總結《新聞聯播》國際新聞操作經驗的《電視國際新聞編輯手冊》一書中強調「政治過硬」（即嚴格遵循黨一國政策，堅持輿論導向）是國際報導的首要原則（頁3），強調「不能跟着西方媒體跑」（頁7），並明確提出「國際新聞的取捨和報導也必須服從於內政大局」（頁5）。由此可見，在依賴國外新聞源的情況下，從關聯政治角度進行新聞實踐已經是《新聞聯播》的操作常規。

## 國際新聞關聯政治的操作策略：研究假設與問題

基於以上分析，本文認為，在中國大陸黨一國新聞體制和改革開放後民族主義崛起的社會情境下，中國電視國際新聞生產中「關聯政治」的特徵主要表現為：國際新聞與國內新聞共同承擔服務於黨一國主導意識型態、強化並維護現存政治合法性、促進國家認同和整合社會的功能，在新聞來源受制於西方媒體的前提下，黨一國力量通過新聞從業者的日常編輯實踐，管理並駕馭國際新聞為國內政治服務。具體地，我們立足《新聞聯播》提出「關聯政治」在中國電視國際新聞中的三種操作策略——自我優先、內外對比、與敏感新聞的最小化，並假設它們會通過新聞內容得到證實與反映。

## 自我優先 (self- prioritization)

國際新聞的「本土中心化」論述告訴我們：與國內新聞相比，國際新聞無論在數量還是深度上都居於次要地位。有意思的是，在新聞史上，中共黨報曾有過國際新聞壓倒國內新聞的時期，<sup>7</sup>而將該模式顛倒成「本土中心化」完成於延安《解放日報》的改版。作為中共新聞史上通過新聞實踐落實毛澤東黨報思想的重要事件，延安《解放日報》改版的重要標誌就是進行版面改造——打破原有的「先國際後國內再邊區」模式（一版為要聞和歐洲消息，二版是遠東新聞，三版是國內新聞，四版是邊區新聞和副刊），而呈現為「一（版）邊區、二（版）國內、三（版）國際、四（版）副刊」的新型版面。這一版面改變並非簡單的形式調整，而是黨報黨性原則的體現，因為它意味着從以國際新聞為主充當資產階級「義務宣傳員」<sup>8</sup>的「不完全黨報」，開始走向「以我為主」宣傳黨的政策、並通過集中報導本地和國內新聞組織發動群眾的「完全黨報」（黃旦，2008）。自此之後，國內新聞位於國際新聞之前、並在篇幅上遠超後者，成為包括《新聞聯播》在內的中國大陸綜合性媒體構成的基本模式。由此可進一步證明，國內新聞而非國際新聞構成新聞的主角，並非單純的「接近性」問題，而是有着關聯政治的潛在需求——要讓受眾感知黨—國政策的影響，服膺內部政權的權威，杜絕「喧賓奪主」。因此，可以假設《新聞聯播》的內容呈現出國內新聞主導的特點，並具體表現在數量、位置、時長等三個方面：

研究假設H1：國內新聞而非國際新聞佔據《新聞聯播》的主體——

H1a：國內新聞的數量和總時長顯著高於國際新聞。

H1b：國內新聞而非國際新聞更多佔據《新聞聯播》的頭條位置。

H1c：國內新聞的平均長度顯著高於國際新聞。

如果說內外新聞的總體分佈構成「自我優先」的第一層，那麼國際新聞內部還存在「自我優先」的第二層。「關聯政治」要求國際新聞與國內新聞相互配合展現中國的國家形象，因此需要在國際新聞中將中國及其領導人置於舞臺的中央，並充分呈現他們的活躍形象與重要地位。它需要證明：中國不僅已經成功地融入世界體系，而且倍受尊敬與肯定，通過這種方式不斷提醒受眾——黨—國的政策富有成效、綜



合國力大大提高，並只有在黨一國帶領下才能增強中國的國際地位與民族自豪感。不管從別的角度看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位置為何，但在中國的電視媒體中，一定要將吊頂的聚光燈重點打在中國的頭上，這既是鞏固政權合法性的需要，也暗合了受眾需求。一個典型的隱喻是：當胡錦濤在參加國際會議合影時，無論他所站的位置實際為何，新華社攝取的照片總是將胡置於畫面的中央。在報導國際重大災難事件時（如東南亞水災或是海地地震）也要先報導中國領導人的表態（如慰問或捐助），再報導事件本身，一切都要將中國和領導人作為國際舞臺上的主角，刻畫他們活躍而融洽的外交行動。即便存在少量與他國的衝突，那也不是中國的問題，而是西方國家的偏見、遏制和干涉內政所造成，從而可以激發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根據上述討論，我們提出研究假設H2-4：

研究假設H2：含中國參與的國際新聞是《新聞聯播》國際新聞的主體——

H2a：中國是國際新聞中報導最多的國家。

H2b：包含中國參與的國際新聞是國際新聞板塊最常出現的頭條。

H2c：包含中國參與的國際新聞的平均長度顯著高於「純」國際新聞。

研究假設H3：在報導中外關係新聞時，中國新聞人物與外國新聞人物相比被提及的頻率、被電視畫面呈現的頻率均更高。

研究假設H4：在報導國際政治時，中外關係新聞與沒有中國參與的「純」國際新聞相比包含更少的衝突。

### 內外對比 (comparison between inside and outside)

如果說「自我優先」是直接的「明托」，那麼「內外對比」就是「暗襯」。為維護黨一國體制的合法性，中國大陸的新聞實踐一貫強調「以正面報導為主」，達到「團結穩定鼓勁」的效果。因此諸如災難新聞這樣被認為具有「負面效果」的題材，長期受到報導的抑制。然而，國際新聞卻為「負面報導」提供了出口。一方面，由於來源的緣故，國際新聞的供給中可能存在的負面消息更多；更重要的，「關聯政治」要通過國

際新聞展現中國的強國形象，除了直接將中國置於舞臺的中央加以聚焦並呈現和諧的外交關係外，還可以通過報導國外的負面消息來對比和映襯，增強民眾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形成「東北老農」頭腦中「風景這邊獨好」的認知效果。因此從自然災害、重大事故，到議會打架、政壇跌盪，這些在國內新聞中面臨嚴格控制的「壞消息」，在國際報導中卻有了充足的存在理由。其一，「壞消息就是好新聞」(bad news is good news)，新聞價值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衝突性，因此它本身完全具備新聞的特質；其二，它場面刺激、畫面十足、甚至充滿戲劇色彩，是市場化改革中電視媒體吸引受眾、獲取商業利益的絕佳素材；第三，也是最關鍵的，它是「別人」的「壞消息」、不是「我們」的「壞消息」，因此不會因報導「他們」影響「我們」的團結，相反還會因看到「他們」的不好，而愈加覺得「我們」的好。據此可以假設，在《新聞聯播》的國際新聞中，相比國內新聞包含更多的負面報導：

研究假設H5：國際新聞與國內新聞相比包含更多的災難/事故。

研究假設H6：國際新聞與國內新聞相比包含更多的衝突。

研究假設H7：國際新聞與國內新聞相比包含更多的暴力。

值得指出的是：國際社會並非一元世界，至少分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北方」與「南方」兩個世界。相對於貧窮、落後、騷亂頻仍的發展中世界和社會主義的兄弟們，中國的改革開放無疑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具有明顯的優越性。但面對經濟、科技和教育高度發達的西方世界，黨一國體制下的中國媒體則面臨難度更高的「關聯政治」挑戰。自從1978年改革開放打開國門，在1949年後特別是「文革」中成功建構的「帝國主義水深火熱」的神話已經破產，使民眾對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產生懷疑。儘管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以「中國崛起」、「民族復興」的話語取代了傳統的「共產主義理想」，但黨一國媒體的「關聯政治」仍須回應這一議題，否則會引發民眾對現存社會主義制度的集體懷疑。媒體可以採取的「關聯政治」操作策略在於，通過國際新聞的建構告訴民眾：儘管西方國家在經濟和物質上領先，但存在衝突、犯罪等一系列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充滿着不安定和不安全，因此中國相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仍具有明顯的優越性(Lee, 1981)。也就是說，相對同處發展中的國家，中國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社會經濟高度發展；而相對經

濟更為發達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又更少衝突，更多和諧，從而在對比中增強民眾的國家認同和對黨—國體制的信心。因此，我們提出如下假設：

研究假設H8：有關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國際新聞與國內新聞相比包含更多的災難/事故、衝突和暴力。

### 敏感新聞的最小化 (minimization of “sensitive” news)

如果說前兩種策略是基於「關聯政治」的主動報導，那麼「敏感新聞的最小化」則是「關聯政治」影響下對某些議題的刻意抑制。黨—國中心從維護現存政治體制和國家穩定出發，會禁止或限制某些特殊議題通過國際新聞的方式對國內政治產生影響。在張森(2006：30)的《電視國際新聞編輯手冊》中，就明確指出對「直接關係社會穩定和我國對外關係、國家安全的重要問題」不得隨意報導，包括「民族宗教問題、某些涉外事件、群體性事件、涉及港澳臺事件、軍事演習領土邊界糾紛、恐怖主義活動、民族分裂活動、極端宗教活動、邪教活動」等敏感題材。從「關聯政治」的視角出發，本文認為至少在兩個題材——西方民主選舉制度和宗教問題上，《新聞聯播》不會渲染，但在中國融入世界體系的背景下，亦不會完全禁止，所以總體上應呈現出「最小化」的特點，並以側重報導簡單結果(如誰當選)和呈現負面問題(如選舉中暴露出的黑幕和引發的動盪)為主。

研究假設H9：《新聞聯播》國際新聞對選舉主題的報導呈最小化。

研究假設H10：《新聞聯播》國際新聞對宗教主題的報導呈最小化。

為驗證這兩個假設，除對《新聞聯播》的內容分析外，還將引用跨國比較資料。

## 研究方法

### 數據

本研究的資料來自於一項大型國際電視新聞比較研究的中國部分，分析物件為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節目。按照協作研究的安排，

共在2008年1-4月抽取出四周的內容(分別為1月20-26日、2月10-16日、3月2-8日、以及3月23-29日)，總共獲取28期節目，840分鐘，784條新聞(日均28條)。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的兩名碩士研究生，在本文作者培訓和多次試編碼的基礎上，根據跨國合作統一的編碼表對每條新聞進行編碼，在本文所分析的變數中，使用Cohen's Kappa計算所得的交互信度(k)均在.85以上。

### 主要變數的操作化

國內新聞與國際新聞的數量：根據新聞發生地是國內還是國外，《新聞聯播》的所有新聞被編碼為兩大類——國內新聞<sup>9</sup>與國際新聞。其中國內新聞又根據是否牽涉到外國，而分為「純粹」的國內新聞(domestic news)、與包含外國參與的國內新聞(domestic news with foreign involvement，如外賓來訪、在中國舉行的國際會議等)；同理，國際新聞根據是否牽涉中國，又分為「純粹」的國際新聞(foreign news)、與包含中國參與的國際新聞(foreign news with domestic involvement)。在檢驗H3和H4時，將包含外國參與的國內新聞和包含中國參與的國際新聞合併組成「中外關係新聞」(Sino-foreign relation news)。

時間：按秒為單位記錄每條新聞持續的時間。

位置：處於每天《新聞聯播》第一條的新聞，和處於國際新聞板塊第一條的新聞被特別記錄。由於《新聞聯播》在國內新聞與國際新聞之間採用音樂間隔，所以很容易編碼。

新聞主題：根據新聞所報導的主要內容，對每條新聞的主題(topic)進行編碼。編碼表共將主題分為25類，如本文分析所關注的國際政治、災難/事故、宗教等；每大類下又分為若干細類，如選舉就屬於「國內政治」主題之下。由於新聞包含的主題可能不止一個(如「胡錦濤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講話」的新聞同時屬於「國內政治」和「經濟」)，因此每條新聞可允許按重要次序最多記錄三個主題。在假設檢驗時，根據每條新聞是否在被記錄的最多三個主題中有一個屬於該主題，編碼為二分變數(0=非該主題新聞，1=該主題新聞)。

新聞人物：所有在新聞中被提及名字(或明顯的頭銜，如美國總

統)、或在電視畫面中直接出鏡發言的人物被編碼為新聞人物。每位新聞人物的來源國家、是否被畫面呈現被記錄。

衝突：編碼者需要根據新聞報導的內容(解說/畫外音)決定每一條新聞中是否包含衝突，如果包含，還要繼續區分其屬於「個人衝突」(如夫妻吵架、買兇殺人)還是「社會衝突」(如政黨爭鬥、流行示威、外交爭議、戰爭等等)。

暴力：六個有關新聞中是否包含暴力及其結果的二分變數被分別編碼——是否報導暴力、是否在畫面中呈現暴力、是否報導有人受傷、是否在畫面中呈現受傷、是否報導財產損失、是否在畫面中呈現財產損失，由於其相關性很高，故在分析中將之組合為一個變數，代表暴力指數(Cronbach's Alpha=.74)。

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本研究中操作化為參加西方八國首腦會議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G8)——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加拿大、日本和俄羅斯。

## 研究發現

### 總體描述

在檢驗假設之前，由於本研究是對中國加入WTO後電視國際新聞少見的系統內容分析，故首先簡要報告一下基本資料。研究發現：在抽樣分析的四周內，《新聞聯播》共報導國內新聞569條(其中純國內新聞508條，佔絕對多數；包含外國參與的國內新聞61條)，國際新聞215條(其中純國際新聞163條，包含中國參與的國際新聞52條)。不含中國，國際新聞共報導了56個國家或地區，其中前十個國家的報導量佔國際新聞總數的56.3%，它們依次是美國、日本、希臘、<sup>10</sup>英國、俄羅斯、比利時、巴基斯坦、瑞士、德國和伊拉克。國際新聞的主題集中在國際政治、國內秩序、國內政治、體育和經濟五大領域。

## 自我優先假設

首先，由上面的分析可見《新聞聯播》中國際新聞僅佔新聞總量的27.4%，不足國內新聞數量的四成。就時間而言，國際新聞的總時長(7,258秒)僅為國內新聞(39,839秒)的18.2%；國際新聞的平均時間為33.76秒，而國內新聞的平均時長為70.02秒，t檢驗顯示兩者之間的差異( $\Delta = 36.26$ )達到顯著程度( $p < .05$ )。在象徵新聞重要性的頭條位置上，《新聞聯播》的28天樣本均被國內新聞佔據。而檢視參與跨國合作研究的其他15個國家或地區的電視新聞資料後發現：別國均不同程度地會將國際新聞作為頭條處理(程度最高的埃及，44.4%的頭條為國際新聞，其中25.9%為純國際新聞)，只有中國大陸例外。因此，《新聞聯播》的報導比重體現出明顯的「自我優先」，H1a-H1c完全得到證明。

在所有215條國際新聞中，24.2%(52條)為包含中國參與的國際新聞，也就是這些新聞雖然發生在國外，但講述的是中國的外交活動，或者與國際社會的經濟、文化交流。這就使得中國成為國際新聞中報導最多的國家，超過了美國(49條，佔22.8%)、日本(16條，佔7.4%)及其他任何國家或地區。不僅如此，在國際新聞板塊的「頭條」中，17條(佔所有樣本的60.7%)為發生在外國的中外關係新聞，這證明《新聞聯播》的確在很大程度上將中國置於國際舞臺的聚光燈下加以凸顯。

在國際新聞中，單純報導外國事務的「純」國際新聞平均時間為26.32秒鐘，而報導中國外交或中外交流的國際新聞平均時間則為57.08秒。t檢驗顯示，兩者之間的差異( $\Delta = 30.76$ )達到顯著程度( $p < .05$ )。無論從報導數量還是時間而言，在國際新聞板塊中，亦更為重視中國外交事務的報導，高調呈現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活躍形象。H2得到證明。

在《新聞聯播》的中外關係新聞(N=113)中，約一半(50.4%)明確提及至少一位新聞人物的名字。在所有新聞人物(89人次)中，中國新聞人物的出現頻率最高，達到50人次，佔總人次的56.2%，其中82%為國家領導人；有30%提及中國新聞人物的中外關係新聞沒有提及任何外國人的名字；76.6%的中國新聞人物被電視畫面呈現，顯著高於外國新聞人物的23.4% ( $\chi^2 = 6.13$ ,  $df = 2$ ,  $p < .05$ )。H3被證實，意味着《新

聞聯播》賦予中國新聞人物、尤其是中國領導人在中外關係新聞中更多的「表演」空間。

在國際政治新聞中 (N=83)，絕大多數 (73.7%) 的「純」國際新聞都包含衝突報導，而僅有 13.3% 的中外關係新聞包含衝突內容，卡方檢驗顯示兩者之間差異達到顯著程度 ( $\chi^2 = 31.03$ ,  $df = 1$ ,  $p < .001$ )，H4 得到證明。這建構出中國外交一幅美好圖景：與世界其他國家融洽相處、氣氛和諧，儘管那些國家之間可能充滿矛盾。那些極少量呈現中國與外國衝突的新聞，則主要集中於拉薩「314事件」和奧運聖火傳遞兩大議題。無疑，對這方面衝突的揭示同樣是「關聯政治」的體現——將中外矛盾架構為西方列強充滿偏見、並企圖干涉中國內政的別有用心，極大地促進了內部整合和民眾動員。

### 內外對比假設

H5 假設「國際新聞與國內新聞相比包含更多的災難/事故」，然而研究結果卻發現：國內新聞中有 20% 屬於災難和事故主題，但在國際新聞中僅有 3.7%，兩者差異達到顯著程度 ( $\chi^2 = 31.61$ ,  $df = 1$ ,  $p < .001$ )，這意味着假設沒有得到支持。這一發現很可能與抽樣範圍有關：在研究時段內 (2008 年 1-2 月) 恰逢中國歷史上罕見的雪災，全國特別是南方地區大範圍的暴雪影響波及 20 多個省、市、自治區，受災人口超過一億，造成了至少 129 人死亡，因災直接經濟損失 1516.5 億元 (民政部，2008)。在這樣的特大災難面前，即便《新聞聯播》這樣的核心喉舌亦無法保持緘默。所以仔細檢視研究資料便可發現，超過 90% 的災難報導均與雪災有關，而如果除去雪災報導，則國內新聞中的災難報導比重將微乎其微；但另一方面，這一發現也反映了事實——在 2003 年「非典」風波之後，中國媒體報導災難性事件的策略本身亦發生變化，即從簡單粗暴的「失語」(拒絕報導) 到更強調輿論引導的技術，如通過「積極救災、親切關懷」框架 (frame) 建構黨和政府的權威高效與民本形象 (如彭鵬、樊永強，2005；孫麗娟，2009)。相反，在報導國外災難——如美國卡特裏娜颶風和海地地震過程中，較多呈現外國政府的救災不力，這同樣形成「關聯政治」的效果。

儘管H5未得到證實，H6和H7均被完全證明。研究發現：27.4%的國際新聞包含衝突，其中24.2%為社會性衝突，3.2%為個人性衝突；與此同時，國內新聞中僅有5.1%包含衝突，其中社會性衝突和個人性衝突分別為4.2%和0.9%。卡方檢驗顯示：在衝突性呈現上，國內新聞與國際新聞的差異達到顯著程度( $\chi^2 = 78.2, df = 1, p < .001$ )。在呈現暴力方面，《新聞聯播》國際新聞中的暴力指數平均數為.20，而國內新聞中的暴力指數平均數為.07，t檢驗顯示，兩者的差異同樣達到顯著程度( $t = -3.45, p < .01$ )。

研究同時顯示：西方八國(G8)佔據了《新聞聯播》國際新聞的47.0%，除了災難/事故之外，它們的確呈現出更多的衝突與暴力(表一)，因此H8基本被證實——《新聞聯播》反映出最發達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儘管物質豐富，但的確充滿着種種社會矛盾與問題。

表一：國內新聞、G8國際新聞、非G8國際新聞「負面新聞」比較

	國內新聞	G8國際新聞	非G8國際新聞	統計檢驗結果
災難/事故	20.0%	2.3%	4.7%	$p < .001$
衝突	5.1%	16.3%	34.9%	$p < .001$
暴力指數	.07	.15	.24	$p < .01$

從表一中亦可發現：雖然比中國國內新聞更多負面報導，但與其他國家相比，G8國家的負面新聞卻相對更少。這說明，G8固然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內外對比襯托中國的關聯政治效果，但外部世界的負面新聞主要來自次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從這個意義上說，似乎可以認為，中國目前的「關聯政治」已經很少秉持僵化的意識型態建構關聯——若從維護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或是維護「南南合作」出發，則本應放大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缺點，而遮蔽或抑制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或社會主義「窮弟兄」的問題，但《新聞聯播》的國際新聞中卻並不少見發展中國家的矛盾與問題，這也是「關聯政治」在國際新聞全球化和中國社會與媒體轉型中才能看到的新特點。



## 敏感新聞最小化假設

研究發現：在《新聞聯播》215條國際新聞中，僅有9條（佔4.0%）關於選舉主題的新聞——其中4條報導俄羅斯、3條報導巴基斯坦、各有1條報導塞爾維亞和泰國。對參加跨國比較研究的16個國家/地區選舉國際新聞比例的卡方檢驗顯示（表二），其差異高度顯著（ $\chi^2 = 189.97$ ,  $df = 15$ ,  $p < .001$ ）。其中，13個國家/地區選舉國際新聞的比例均高於中國（最高的南非，選舉國際新聞比例達27.2%），低於中國的僅有巴西和智利。而對當年的熱點選舉事件——美國大選，樣本中《新聞聯播》報導數量為0，是參與本次跨國比較研究國家/地區中唯一的例外，也影響了總體卡方檢驗所呈現的顯著差異結果（ $\chi^2 = 148.88$ ,  $df = 14$ ,  $p < .001$ ）。有意思的是，同屬大中華區的香港電視媒體，對美國大選的關注最高（報導比例達17.6%）。雖然經檢視資料後發現，《新聞聯播》在非抽樣時段內對美國大選進行了一定的報導（側重選舉結果），但其國際報導對選舉議題的「最小化」處理可被基本證實（H9）。

表二同時顯示：《新聞聯播》對宗教題材的報導亦呈現最小化趨向。儘管宗教題材在各國國際新聞中所佔比例均不算太高，但總體差異仍高度顯著（ $\chi^2 = 152.33$ ,  $df = 15$ ,  $p < .001$ ）。其中，《新聞聯播》沒有任何報導，在所有國家/地區中比例最低。H10亦得到證明。

表二：不同國家/地區選舉與宗教主題的國際新聞數量及比例比較

	選舉國際新聞 <sup>a</sup>	宗教國際新聞 <sup>b</sup>	美國大選新聞 <sup>c</sup>
中國大陸	9 (4.0%)	0 (0.0%)	0 (0.0%)
比利時	48 (9.4%)	14 (2.8%)	27 (5.3%)
巴西	7 (2.8%)	3 (1.2%)	7 (2.8%)
加拿大	56 (17.2%)	6 (1.8%)	38 (11.7%)
智利	11 (2.4%)	5 (1.1%)	8 (1.8%)
德國	33 (9.7%)	18 (5.3%)	17 (5%)
香港	43 (26.1%)	3 (1.8%)	29 (17.6%)
以色列	43 (11.5%)	6 (1.6%)	34 (9.1%)

(續上頁)

義大利	18 (12.2%)	14 (9.5%)	14 (9.5%)
波蘭	39 (20.9%)	8 (4.3%)	10 (5.3%)
葡萄牙	46 (10.2%)	20 (4.5%)	20 (4.5%)
新加坡	71 (15.9%)	4 (0.9%)	14 (3.1%)
南非	52 (27.2%)	3 (2.1%)	7 (3.7%)
瑞士	102 (17.2%)	28 (4.7%)	47 (8.0%)
臺灣	28 (15.1%)	1 (0.5%)	17 (9.2%)
美國	8 (4.5%)	1 (0.6%)	[145 (22.2%)]

a.  $\chi^2 = 189.97$ ,  $df = 15$ ,  $p < .001$ 。

b.  $\chi^2 = 152.33$ ,  $df = 15$ ,  $p < .001$ 。

c.  $\chi^2 = 148.88$ ,  $df = 14$ ,  $p < .001$ 。本卡方檢驗不包含美國自身。

## 結論與討論

### 政治與市場雙重控制下的關聯政治

本文通過對《新聞聯播》的系統內容分析，基本證實了有關中國電視國際新聞的「關聯政治」假設。研究確認：中國電視國際新聞呈現出明顯的自我優先、內外對比、及敏感新聞最小化的特徵。在國際新聞來源倚重西方媒體的情況下，經由新聞組織和從業者的實踐，選擇性地報導與建構世界版圖中的中國形象，將中國和中國領導人置於舞臺的中央，向國人高度呈現中國活躍而成功的外部形象；通過更多呈現外部世界、包括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的負面新聞——尤其是衝突與暴力，反襯中國社會在經濟發展之下仍舊保持溫情脈脈的和諧圖景；通過最低限度呈現外國選舉制度和宗教議題，避免敏感題材對中國內政所可能造成的衝擊。這些操作策略及其內容呈現，無疑將國內新聞與國際新聞整合起來，向民眾展現一幅貌離神合的內外場景。

關聯政治的新聞操作適應於中國黨—國體制和改革開放後的社會轉型。媒體通過改革實現「有限創新」，黨—國力量與媒體從業者在追逐市場和商業利益上高度合謀，但黨的新聞體制的核心原則維持不變

運作自如。通過黨一國的直接政治控制、以及市場利益的誘惑（將民族主義作為換取商業利益的安全素材），黨一國核心的關聯政治訴求得以轉化為媒體組織和從業者的常規實踐。

關聯政治在轉型期的中國社會承擔着獨特的功能。即便是在全球化時代，真正跨越邊界、走出國門，參與現實國際交往的國民畢竟只是少數，作為典型的「非強制性議題」（Zucker, 1978），大眾媒體、特別是電視新聞仍然是公眾瞭解外部世界的最主要管道。《新聞聯播》為代表的電視新聞節目，決定着絕大多數中國人看到怎樣的世界圖景，影響着中國公眾的國際認知與對外態度。通過關聯政治的新聞操作，國際新聞強化了黨一國體制的合法性，促進了普通民眾對中國國際地位的認知，並由此激發他們的國家認同和民族自信，維護了社會的穩定和凝聚。

然而，關聯政治同時意味着國際新聞並未向受眾呈現一幅真實可信的世界圖景。雖然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媒體，包括《新聞聯播》提供了較為充分的國際資訊，包括重大的全球性新聞，但「關聯政治」的操作策略使得國際新聞是高度選擇性、偏差化的。無論是將中國和中國領導人始終置於世界舞臺的中央、將中國的外交關係塑造成高度和諧、還是高密度呈現西方和他國的負面新聞、以及抑制所謂的「敏感」新聞，都將使得中國媒體的探照燈未能將世界舞臺完整而真切地照亮，這種系統性的聚焦或遮蔽可能造就虛幻的受眾感知，並由此產生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舉例來說，一方面從「自我優先」原則出發很少報導中國與其他國家由來已久的觀念差異與利益衝突，另一方面又從呼應民族主義情緒出發突然高調渲染西方國家和媒體對中國的攻擊——例如2008年的「拉薩314事件」和「奧運聖火傳遞事件」。這一傳播機制顯然無助於中外之間理性的溝通與交流。更重要的是，由於關聯政治的根本出發點在於維護黨一國權威，因此它無法導向媒體服務於公眾利益的根本目標，也愈加暴露出中國媒體「有限創新」的制度性局限——擁抱市場力量，卻無法對公眾利益產生基本的承諾。黨一國強大的政治控制與新的市場機制的結合，使得關聯政治愈加有效，卻離媒體改革的真正目標差之萬里。

當然，在市場與國家權威互動的新型社會與媒體制度下，也能看

到國際新聞在「關聯政治」操作中所具有的局部性「邊緣突破」色彩。內容分析發現：國際新聞並未相比國內新聞報導更多的災難/事故，也並未保持僵化地從維護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陣營出發進行內外對比操作，這些都可視為市場改革下中國媒體關聯政治的新特點。另一方面，儘管國際新聞中呈現更多的衝突與暴力存在着關聯政治的內在需求，但同時也的確使得新聞在語態上走出了僵化的話語模式，呈現出輕鬆、感性，也更符合新聞價值的一面。雖然更多衝突/暴力具有新聞來源依賴國際媒體的基礎，但選擇並呈現它們則是《新聞聯播》的主動行為。因此，我們看到：中國受眾給予國際新聞更高的關注度，在對《新聞聯播》節目的觀眾調查中，研究者發現喜愛國內新聞板塊的受眾僅佔30%，而喜愛國際新聞報導板塊的則有70%（張開，2007）。對新聞從業者的訪談也反映，黨一國體制下的部分新聞從業者會認為國際新聞「更像新聞」，並從中找到「真正做新聞的感覺」。<sup>11</sup>而內外新聞之間的這種差異，也可能對國內新聞造成「傳遞」效應與「脫敏」意義——使得對國內的負面報導也變得逐漸可以進入「邊緣突破」區域。本研究中反映出的《新聞聯播》對2008年雪災的大幅報導，雖然仍明顯存在「關聯政治」的操作框架，卻畢竟走出了「能夠報導」的第一步，其中多少會有國際新聞大量報導帶來的脫敏效應——使黨一國力量逐漸覺得報導也沒甚麼大不了。誠如黃煜和郭中實(2001)在分析中國大陸的英語傳媒功能時所指出的，國際新聞在中國大陸也具有某種雜交和變異(hybridization)的意義，成為傳媒變革的一種動因。自然，不要過高估計這種雜交帶來的變異，「文化混交未必影響既存的權力關係」(Pieterse, 1995)，但是這種變異的力量，長遠來講，至少有可能改變根深蒂固的「黨八股」新聞話語模式。

而市場力量所能帶來的潛在變化歸根結底依賴於它跟政治權力結構如何互動，後者是決定中國國際新聞走向的核心控制力量，其控制之下所形成的媒體操作「慣習」相當強大。例如：國際新聞「自我優先」操作的重要常規之一是在報導國際重大災難新聞時，將中國領導人的反應置於災難事實之前。雖然央視國際新聞的主編表示這在時間和邏輯上都存在明顯的問題，但因「長年以來一直都是這樣操作的」（張森，2006：124），所以迄今沒有改變的跡象。

## 另類「關聯政治」與「關聯政治」的另類解讀

在政治和市場雙重控制的整體媒體生態下，《新聞聯播》國際新聞的關聯政治操作是中國電視國際報導、乃至中國國際報導的共性。特別是對地方電視臺、黨報和絕大多數都市報，本文提出的國際新聞關聯政治操作模式，應該都具有適用性，甚至會因新華社是報紙國際新聞的主要提供者而更明顯。但在中國社會轉型與市場化媒體改革的背景下，國際新聞的關聯政治亦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呈現複雜多元的局面，儘管這種複雜多元是高度局部化、碎片化的。

一方面，中國媒體的國際新聞存在局部的另類「關聯政治」。所謂「另類」，是針對「關聯政治」的主流模式而言，即這種「關聯政治」不是管理國際新聞與國內新聞相配合、服務於黨一國權威和政治穩定，而恰恰是希望借助國際新聞的報導來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與社會變遷。其基礎在於中國媒體改革中出現的傳媒分化，一部分市場化報紙，在改革中選擇接受與服膺新聞專業主義的基本觀念，希望通過媒體服務於公眾利益，促進中國公民社會的構建。這些媒體——例如上海的《東方早報》、廣東的《南方都市報》、《南方週末》等，對國際報導一向較為熱心。與《新聞聯播》最小化報導美國大選不同，《東方早報》在美國大選期間曾推出專題「見證美國的民主」，系統呈現選舉過程；而「南方系」報刊經常利用國際新聞包裹推動國內政治改革的「隱藏話語」(hidden transcripts)，例如《南都週刊》2009年曾推出深度報導「拆牆20年」，通過對1989年德國柏林牆倒塌的歷史回顧與現況透析，表達呼喚自由的蘊味。在中國大陸因強拆公民私有住宅而造成社會矛盾激化，甚至發生成都市民唐福珍自焚慘劇的背景下，國內多家媒體都刊登美國一公司因老太太拒絕搬遷而改變商業中心設計造型的消息，很顯然，與防範國際報導對內部政治體制的衝擊不同，這裏呈現的另類「關聯政治」則希望以國外的先進理念和舉措，來推動國內的制度變革與社會進步。

另一方面，亦可能出現「關聯政治」的另類解讀。趙本山所扮演的「東北老農」代表了對中國國際新聞報導的主導式解讀方式，然而在中國社會階層分化的背景下，國際新聞在傳播效果上完全可能分化。如果說「趙式老農」能夠代表創作者所想像的農民群體，那麼其他的社會

階層，特別是中高階層——至少是一部分經常在互聯網上進行時事表達的年輕、高知線民，更可能對黨一國權力「關聯政治」編碼的國際新聞進行協商式甚至對抗式解讀。在1980年代中國報紙的國際報導中就曾發生過「雷根兒子失業」用以代表美國經濟衰退的主流「關聯政治」編碼被民眾進行「美國總統如此廉潔」的另類解讀案例，在現今的電視國際新聞報導中則更層出不窮。僅舉一例：2009年底義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在出席活動中遭受重擊，鮮血橫流狼狽不堪，本可凸顯西方世界混亂政治之現實，但卻被線民反向關聯解讀為對中國國內城管橫行和缺乏民主的諷刺。

因此，一方面我們強調《新聞聯播》國際新聞的關聯政治模式在黨一國壟斷體制的保護下依然居於主流，並通過各地方媒體不斷複製，通過趙本山之類的小品不斷強化，反復「再生產」着主流意識型態；但與此同時，也應注意到那些局部性、碎片式、以隱藏話語形式出現的「另類關聯政治」和「關聯政治」的另類解讀，及其對中國社會和媒體轉型的潛在解放意義。

### 關聯政治的個案意義與普遍價值

本文的主要貢獻在於以「關聯政治」的理論概念和視角闡釋國際新聞如何建構內外不同而又相互關聯的意向，從而打破以往割裂對待的研究取向，並通過《新聞聯播》的系統內容分析進行了經驗證實。但研究在以下方面值得改進或深入：首先，由於並非完全的隨機抽樣，本文所發現的結論有可能因時間和事件的選擇有所偏差，因此未來的研究應建諸更具代表性的樣本，文中基於中國媒體的整體制度環境所做的「關聯政治」對其他媒體的適用性假設，也需要更完整的經驗研究；第二，囿於方法和空間的限制，本文亦無法涵蓋國際新聞「關聯政治」操作的所有機制，其中特別重要、本文也有所提及，但尚未充分展開的是如何基於國內需要/立場建構國際新聞的框架。在全球化背景下，《新聞聯播》亦無法回避一些重大「敏感」新聞的報導——如「顏色革命」、伊朗選舉騷亂等，因此媒體如何通過有效的框架設定與話語修辭，降低「外」對「內」的可能衝擊，要揭示這一機制特別需要質化的個

案剖析和文本研究。事實上，通過其他方法，對「自我優先」機制內涵的闡發在未來也可進一步豐富（例如中外關係報導如何通過話語修辭凸顯「主人」與「賓客」的角色）。

最後，本文以《新聞聯播》為例剖析了中國電視國際新聞中「關聯政治」的運作機制，並通過內容分析得到證明。那麼這僅僅是一個「中國故事」還是具有全球共性的標本？從「關聯政治」所代表的國際新聞「本土中心化」的理論路徑出發，我們不認為「關聯政治」是中國國際新聞的特例，相反它應該是國際新聞的普遍性特徵，但在不同的政治體制與媒體制度下有不同形式與路徑的呈現。

就理論上而言，學者們認為，國際新聞的生產邏輯類似於國內新聞。甘斯(Gans, 1979)就指出，美國媒體的國際新聞報導以美國人或美國的利益為基準，將主題轉化得與國內新聞相互合拍；對新聞記者的調查也表明，大多數新聞從業者認為他們必須考慮國家的士氣與國家形象(Shamir, 1988)。所有這些有關國際新聞「本土中心化」的論述都為在其他政治體制和媒體制度下考察「關聯政治」現象提供了資源和基礎。在經驗層面上，參與跨國電視國際新聞合作研究的16個國家/地區的資料顯示，除埃及外，其餘15個國家/地區國內新聞的數量比例均高於國際新聞，其中美國、臺灣等四個國家/地區「自我優先」的程度均高於中國大陸。這說明，從內外新聞關聯的角度考察國際新聞的生產，在其他國家應具備充足的基礎。當然，以《新聞聯播》為代表的中國電視國際報導，無疑代表了「關聯政治」一種獨特的操作模式，即在黨一國力量仍對媒體擁有嚴格政治控制的前提下，又與市場力量相互匯合，產生了將國際新聞加以管理、並主要服務於內部整合與社會動員的政治需求，並通過新聞實踐常規加以落實，這一動力源泉和運作邏輯在多元民主建制下應當迥然有異。但國際新聞鑲嵌於民族國家特定政經秩序與權力結構，並受其制約的結構性特徵全球並無二致。因此，未來的研究，應當進一步在跨國比較分析的基礎上廓清「關聯政治」在不同政治和媒體制度下的運作邏輯與操作策略，從而更清晰地闡發其理論意義與普遍價值。

## 註釋

1. 本文的寫作基於一個跨國電視新聞比較研究專案，項目總發起人為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的Akiba Cohen教授，中國大陸地區的負責人為陳韜文教授，本文作者為共同負責人，並具體負責了中國大陸地區電視新聞節目的編碼工作。作者衷心感謝陳韜文教授所給予的寶貴支持。感謝復旦大學的周海晏、於穎同學參與編碼，感謝參與國際比較專案的其他國家或地區學者提供的資料。作者同時感謝兩位匿名評審人和李立峯教授對論文初稿提出的寶貴意見。
2. 本文用「本土中心化」(ethnocentrification)涵蓋了從新聞整體構成、到影響新聞生產的因素等各個層面上以本土利益和興趣為旨歸的現象，而「本土化」(localization)可視為與「馴化」(domestication)含義相近的概念，只代表了「本土中心化」概念下的一個層面。
3. 後面會談到，目前中國電視國際新聞的主要來源是國際主流通訊社，因此其初始採集由西方媒體完成。
4. 儘管近年來互聯網等新媒介技術在中國取得了飛速發展，但電視仍然是人們獲取新聞尤其是國際新聞資訊的最主要管道。根據中國內地最大的收視率調查公司CSM的最新統計(王蘭柱，2009)，電視在中國大陸的普及率高達97.9%，全國電視觀眾規模為12.36億，佔4歲及以上總人口的97%，電視觀眾人均每天收視時間達到175分鐘，無論從普及率還是接觸時間來看，電視都是多媒體環境中的第一媒介。相比之下，截至2009年底中國線民比例仍只有28.9%(CNNIC, 2010)。即便是青年受眾而言，2006年的一項調查表明，60%的受訪者表示是通過電視新聞來瞭解國際動態，這一資料遠遠超過網路的19.2%(張開，2007)。
5. 據本文作者對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紀實頻道相關編導的訪談，2009年10月24日。
6. 據報導，2008年，央視廣告收入超過170億元人民幣(李默風，2010)。央視的利潤很大部分上交給國家廣電總局，從而獲得後者更大的行政保護。
7. 1941年延安《解放日報》創刊到1942年改版之前，在博古主持下參照國際「大報」模式、並適應於當時的「二戰」背景，建立起頭版為要聞和歐洲消息、二版為遠東新聞、三版和四版才是國內和邊區新聞的版面模式。參見黃旦(2008)。
8. 這一評價出自1942年3月16日發出的《中宣部為改造黨報的通知》，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1980:126)。



9. 根據其所處的版面位置，有關香港、澳門和臺灣的新聞在編碼中作為「國內新聞」處理。
10. 與北京奧運聖火傳遞有關。
11. 據本文作者對北京國際新聞編輯的訪談，2009年6月13日。

## 參考文獻

- CCTV.com (2009)。〈中策橡膠4720萬元奪央視新聞聯播廣告「標王」〉。上網日期：2009年11月19日，取自<http://ev.cctv.com/20091119/101863.shtml>。
- CNNIC (中國互聯網路資訊中心，2010)。《中國互聯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上網日期：2010年1月15日，取自<http://www.cnnic.net.cn/uploadfiles/pdf/2010/1/15/101600.pdf>。
- 丁剛(2005)。〈國際新聞中的國家立場〉。《中國記者》，第6期，頁54–55。
-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1980)。《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彙編》(上卷)。北京：新華出版社。
- 王蘭柱(主編)(2009)。《中國電視收視年鑒2009》。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 民政部(2008年2月24日)。〈民政部通報近期低溫雨雪冰凍災情和救災工作情況〉。取自<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mzyw/200802/20080200011960.shtml>。
- 艾紅紅(2008)。《〈新聞聯播〉研究》。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 朱虹(2010)。〈就2009年廣播電視發展最新資料答記者問〉。上網日期：2010年1月14日，取自<http://www.sarft.gov.cn/articles/2010/01/14/20100114151954500336.html>。
- 何英(2004)。〈美國媒體對華負面報導的建構主義解讀〉。《國際觀察》，第2期，頁13。
- 李默風(2010)。〈國家網路電視臺高調上線 各方加速市場卡位〉。《IT時代週刊》，第3期，上網日期：2010年1月26日，取自該刊網站<http://www.ittime.com.cn/Content.asp?id=7979>。
- 李巍、王勇(2006)。〈國際關係研究層次的回落〉。《國際政治科學》，第3期，頁112–142。
- 胡錦濤(2007)。〈在黨的十七大上的報告〉。上網日期：2007年12月24日，取自[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8568\\_10.htm](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8568_10.htm)。
- 孫麗娟(2009)。〈探析文化因素與中外災難新聞報導的影響〉。《新聞傳播》，第4期，頁24–29。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13期(2010)

- 袁雷(2009)。〈國際新聞傳播的壟斷與反壟斷〉。《新聞記者》，第11期，頁30-32。
- 陳力丹、焦中棟(2008)。〈向「以新聞為本位」漸進靠攏〉。《聲屏世界》，第11期，頁4-6。
- 陳韜文、李金銓、潘忠黨、蘇鑰機(2002)。〈國際新聞的「馴化」：香港回歸報導比較研究〉。《新聞學研究》，第73期，頁1-28。
- 陸曄、潘忠黨(2002)。〈成名的想像：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新聞從業者的專業主義話語建構〉。《新聞學研究》，第71期，頁17-60。
- 張森(2006)。《電視國際新聞編輯手冊》。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 張開(2007)。〈青年人新聞消費調查與研究〉。《現代傳播》，第5期，頁124-127。
- 彭鵬、樊永強(2005)。〈悲劇的中國式處理與新聞的健康表達〉。《新聞與傳播研究》，第3期，頁23-30。
- 黃升民、周豔、宋紅梅(2008)。〈中國廣電媒介三十年變遷的產業化解析〉。《傳播與社會學刊》，第6期，頁49-70。
- 黃旦(2008)。〈從「不完全黨報」到「完全黨報」——延安《解放日報》改版再審視〉。李金銓(編)，《文人論政——知識份子與報刊》(頁250-280)。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黃煜、李金銓(2004)。〈九十年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媒介建構〉。李金銓，《超越西方霸權》(頁95-11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黃煜、郭中實(2002)。〈改革開放中的大陸英語傳媒及功能分析〉。《傳媒透視》(香港)，第2期，頁15-18。
- 福特納(2000)。《國際傳播》。北京：華夏出版社。(原書Fortner, R. S. [1993].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Belmont, CA: Wadsworth.)
- 潘忠黨(1997)。〈新聞改革與新聞體制的改造〉。《新聞與傳播研究》，第3期，頁62-80。
- 潘忠黨(2007)。〈有限創新與媒介變遷〉。《文化研究》，第7輯，頁7-25。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劉雲山(2006年11月9日)。〈在中國新聞獎長江韜奮獎頒獎報告會上的講話〉。上網日期：2006年11月9日，取自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5018223.html>。
- 劉鵬雲(2009年6月17日)。〈《新聞聯播》改版將強化國際新聞變化不會太大〉。上網日期：2009年6月17日，取自<http://news.163.com/09/0617/09/5C0HKN7Q0001124J.html>。
- 鐘龍彪、王俊(2007)。〈從單層博弈到雙層博弈：中國外交決策模式的變遷〉。

- 《世界經濟與政治》，第7期，頁62-68。
- Boyd-Barrent, O., & Rantanen, T. (Eds.). (1998). *The globalization of news*. London: Sage.
- Chan, J. M. (2000). When capitalist and socialist television clash. In C. C. Lee (Ed.), *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pp. 245-270).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Chang, T. K. (1998). All countries not created to be new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5, 528-563.
- Chang, T. K., Wang, J., & Chen, C. H. (1998).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imager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U.S. and Chinese national TV new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42 (3), 277-296.
- Chang, T. K., Wang, J., & Chan, Y. (2002), *China's window on the world : TV news, social knowledge, and international spectacles*.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 Cohen, A. A., Levy, M. R., Roeh, I., & Gurevitch, M. (Eds.). (1996). *Global newsrooms, local audiences: A study of the Eurovision news exchange*. London: J. Libbey.
- Coser, L. (1969). *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onflict*. New York: Free Press.
- Dyan, D., & Katz, E. (1992). *Media events: 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Entman, R. M. (1991). Framing US coverage of international new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1 (4), 6-27.
- Fenby, J. (1986). *The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s*. New York: Schocken.
- Galtung, J. (1992). *Global glasnost: Toward a 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 Gans, H. J. (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New York: Vintage.
- Giddens, A.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nzenbach, W. J., Arant, M. D., & Stevenson, R. L. (1992). The world of U.S. network television news: Eighteen years of international and foreign news coverag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50, 53-72.
- Grundmann, R., Smith, D., & Wright, S. (2000). National elites and transnational discourses in the Balkan War.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5, 299-320.
- He, Z. (2000).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ess in a tug-of-war. In C. C. Lee (Ed.), *Power, money, and media* (pp. 112-151). Evanston,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Herman, E. S., & Chomsky, N. (2002). *Manufacturing consen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Ishii, K. (1996). Is the U.S. over-reported in the Japanese press? *Gazette*, 57, 135–144.
- Johnson, M. A. (1997). Predicting news flow from Mexico.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4 (2), 315–330.
- Kaid, L. L., Harville, B., Ballotti, J., & Wawrzyniak, M. (1993). Telling the Gulf War story. In B. S. Greenberg and W. Gantz (Eds.), *Desert storm and the mass media* (pp. 86–98).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 Kareil, H. G., & Rosenvill, L. A. (1984). Factors influencing international news flow. *Journalism Quarterly*, 61, 509–516.
- Lash, S. and Urry, J. (1994). *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 London: Sage.
- Lee, C. C. (1981). The United States as seen through the People's Dail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 92–101.
- Lee, C. C., Chan, J. M., Pan, Z. D., & So, K. Y. K. (2000). National prisms of a global “media event.” In J. Curran & M.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pp. 295–309). London: Arnold.
- Lee, C. C., & Yang, J. (1995). National interest and foreign news. *Gazette*, 56, 1–18.
- Liao, K. S. (1976). Linkage politics in China: Internal mobilization and articulated external hostility in cultural revolution, 1967–1969. *World Politics*, 28 (4), 590–610.
- Lippmann, W. (1922).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Milner, H. V. (1997). *Interests, institutions, and informati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Nosseck, H. (2004). Our news and their news. *Journalism*, 5 (3), 343–368.
- Pieterse, J. N. (1995). Globalization as hybridization. In M. Featherstone, S. Lash & R. Robertson (Eds.), *Global modernities* (pp. 45–68). London: Sage.
- Rosenau, J. K. (1969). *Linkage politics: Essays on the convergence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pp. 1–20). New York: Free Press.
- Putnam, R. D. (1993).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 P. B. Evans, H. K. Jacobson, & R. D. Putnam (Eds.), *Double-edged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 (pp. 431–468).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aid, E. W. (1981). *Covering Islam: How the media and the experts determine how we see the rest of the world*. New York: Pantheon.
- Said, E. W. (199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Knopf.
- Shamir, J. (1988). Israeli elite journalism: Views on freedom and responsibility. *Journalism Quarterly*, 63, 589–94.
- Sreberny-Mohammadi, A. (1991).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J. Curran & M.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pp. 118–138). London: Edward Arnold.

- Sreberny-Mohammadi, A., Winseck, D., McKenna, J., & Boyd-Barrett, O. (1997). Editor's Introduction to Media in Global Context. In A. Sreberny-Mohammadi, D. Winseck, J. McKenna, & O. Boyd-Barrett (Eds.), *Media in global context: A reader* (pp. ix–xxviii). London: Edward Arnold.
- Utley, G. (1997). The shrinking of foreign news. *Foreign Affairs*, 76 (2), 2–10.
- Wilkenfeld, J. (1971). Domestic and foreign conflict behavior of nations. In W. D. Coplin & C. W. Kegley, Jr (Eds.), *A multi-method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09–204). Chicago: Markham.
- Wu, H. D. (2000). Systemic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news coverage: A comparison of 38 countri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0 (1), 110–130.
- Zucker, H. G. (1978). The variable nature of news media influence. In B. D. Ruben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2* (pp. 225–240).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